

教师人文读本

修订本

总主编 张民生 于漪

执行主编

商友敬 尹后庆 吴国平

JIAOSHIRENWEN

DUBEN

上册

教师人文读本

总主编 张民生 于漪

执行主编 商友敬 尹后庆 吴国平

JIAOSHIRENWEN
DUBEN

上册 修订本

《教师人文读本》

编委会

总主编：张民生 于漪

执行主编：商友敬 尹后庆 吴国平

编委：王栋生 陈小英 余党绪 张德胜
郑桂华 赵志伟 黄玉峰 商友仁
温泽远 谭轶斌 朱永新 肖川

前　言

我们是教师，都是些普通的人，但我们从事着神圣的事业。

我们每天面对着的是人，我们的学生，他们天真、可爱、充满生命的活力和幻想，他们对我们无限地信任和敬慕。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对话和交流中，他们求知，他们长才，他们立志，他们成长，成为自立的个体，成为家庭的支柱，成为社会的栋梁。而我们每一个教师，除了岁月的流逝之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们的知识在教学中更充实，我们的智慧在交流中更增长。我们付出了多少爱，得到的是更多的爱；我们对学生有多少理解，他们会给我们更多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幸福。

但是，我们也经常困惑、烦恼，甚至痛苦。我们也经常遇到阻力、误解，甚至非难。正常的知识传承，往往变成机械的操练；坦诚的心灵交流，往往变成枯燥乏味的训诫，加上人事的纠纷、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这些使我们的心灵失衡而不知所措。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有相应的改革和时间，但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并持一种积极的态度，确实是我们应当不断自省的。先辈、前辈和同辈中有不少楷模，为我们树立起精神的

支柱，究其核心，那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即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博大精深，但首先是爱，惟其有了爱，我们才能成为一个育人之人。我们爱祖国、爱同胞、爱亲人，当然也爱自己。我们爱科学、爱艺术、爱自然，但我们对教育和我们可爱的学生应该付出最多的爱。

在爱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坚守和充实我们为师的一些基本观念：平等、真诚、守信、博学、崇德……这些是我们立足于世的根基，是我们生活的坐标，也是我们为人师表的基础。

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还要思考那些人生的基本问题：生与死、宇宙与人生、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道德与审美……这些问题既推动我们又困惑我们，使我们始终处于不断思考和追求之中。

本书编委会的成员都是教育工作者，是一群爱读书、爱思考的人。我们将自己平日读书的心得和自认为最有价值的文章，汇集在一起与广大读者交流，按照“感性——知性——理性”的层次，汇编成本书。囿于见闻和学养，当然是很不完美的。

希望读者能喜欢它、感悟它、理解它，在与作者的对话和交流中共同进入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世界，然后把这一切带进课堂，与我们的学生共享。

本书编委会

我的教师梦(代序)

钱理群

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来。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些时候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19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1956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

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自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一个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18

年：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地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地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

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地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地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

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这本身就实现了一种价值，一种生命的价值，而且是教师所特有的。我与这个女孩子通信的价值绝不亚于我的学术写作的价值。至少说在我心目中是同等的——我的学术写作追求的也就是这样的心灵的交流。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的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做出反应，提出意见，也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教育决不是单向的，绝不是老师单方面地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老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本身都会引发老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附中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你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只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兴奋感、紧张感。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一年在 9

月1号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要准备好这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木呆呆地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一个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我看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原来是陌生的多少有点敬畏的大学教授了。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才对王栋生老师说：没问题了。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恐惧于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是那样，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人打交道。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吸取精神养料，吸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教学就是这样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好的教育境界。我

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的惨烈的记忆。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文革前，我已经说过，我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发现学生都非常穷困，于是就主动地给他们买衣服，买袜子、鞋，对于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当教师的就应该这么做；没想到文革一开始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就成了我的一条罪名。有一天我睡觉醒来，看见房间里面挂着我送给学生的衣服，旁边写着“钱理群，还给你的狗皮”几个大字。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被捅了一刀，而且这是我心爱的学生捅的，我真是伤心透了。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还是为他们说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限，拍毕业照拒绝我参加。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话：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他的这一态度使我的流血的心灵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老师的蠢事。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的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目 录(上册)

我的教师梦(代序) 1 钱理群

第一单元 我为什么而活着

时间	2	沈从文
生命	5	沉 河
犹太三星	11	卞毓方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16	王小波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9	海伦·凯勒
人	26	高尔基
我的呼吁	32	史怀哲
我为什么而活着	35	罗 素

第二单元 爱

最难写的两个字——祖国	38	韩美林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46	季羡林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51	鲁 迅
多年父子成兄弟	59	汪曾祺
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	62	屠格涅夫
在寺院门口	64	纪伯伦
爱	68	爱默生

第三单元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名师	75	许渊冲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怀念陈垣先生	81	启 功
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	93	傅斯年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96	季美林
化尘残影	104	金克木
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	109	钱理群
橘黄色的梦	113	王蒙

第四单元 慢慢走,欣赏啊!

“慢慢走,欣赏啊!”	118	朱光潜
美从何处寻	123	宗白华
人生的乐趣	129	林语堂
书法漫谈	134	黄苗子
中国音乐在中国	137	王安忆
说园	143	陈从周

第五单元 站着读还是跪着读

站着读还是跪着读	150	陈四益
百年思考	153	龙应台
怎样读一本书	162	艾德勒
人类知识的统一性	169	玻 尔
还有什么是可以希望的呢	174	波 恩
读书	181	萨 特

第六单元 科学是美丽的

科学是美丽的	188	沈致远
走出“半个人”的时代(节选)	193	杨叔子
我的中美两国导师	206	杨振宁
有数,就有美	210	翟 墨
心通天宇的艺术与科学	214	刘巨德
真理面前半步也不后退	219	布鲁诺

第七单元 与自然为友

与自然为友:一种现代公民意识	222	梁从诫
敬畏生命	234	王一方
自然的奥秘	237	汤因比
基因密码与不死药	241	雷抒雁
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忧虑	244	詹克明

第八单元 我有一个梦

世界人权宣言	251	联合国大会
论四大自由	256	罗斯福
林肯的恶梦	258	钱满素
平等	263	伏尔泰
我有一个梦	267	小马丁·路德·金
自由与容忍	271	张中行

第二
单元

我为什么而活着

时 间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出生于湖南凤凰县。15岁就离开家乡当兵。1922年，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开始写作求生。1928年到上海，与丁玲合编《红与黑》并参加新月社。此后历任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职。1934年，发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成为“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在上个世纪三四十代的历次论争中，他一再显出与左翼文学思潮的隔膜，1948年被郭沫若点名批判。后从事工艺美术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一股“沈从文热”，对他作品的评价越来越高。近年他的书信集《从文家书》初版后，更引起了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他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湘西艺术世界，体现了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和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这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革命为主题的文坛，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因为沈从文的美文，许多人到凤凰来寻梦。他的墓地前有一块碑，上面是其表侄黄永玉刚健的墨迹：“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代表着凤凰人对沈从文的温情，而沈从文也以一生的时间“造起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一切存在严格地说都需要“时间”。时间证实一切，因为它改变一切。气候寒暑，草木荣枯，人从生到死，都不能缺少时间，都从时间上发生作用。

常说到“生命的意义”或“生命的价值”。其实一个人活下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占有几十个年头的时间罢了。生前世界没有他，他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活到不能再活死掉了，他没有生命，他自然更无意义和价值可言。

正仿佛多数人的愚昧与少数人的聪明，对生命下的结论差不多都以为是“生命的意义同价值是活个几十年”，因此都肯定生活，那么吃，喝，睡觉，吵架，恋爱……活下去等待死，死后让棺木来装殓他，黄土来掩埋他，蛆虫来收拾他。

生命的意义解释的即如此单纯，“活下去，活着，倒下，死了”。未免太可怕了。